

How these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at was happening then? Opening a books is to enter a whole worl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writers and readers i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oul. How these books were introduced into China? What was happening then? Opening a books is to enter a whole world. The communication between translators, writers and readers is the conversation between the earth and the soul. 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



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

杨 绛 李文俊
罗新璋 钱春绮 等著

昆仑出版社

一本书和一个世界

一本书 和一个世界



翻译家笔谈世界文学名著“到中国”

杨 绛 李文俊 罗新璋 钱春绮 等著

郑鲁南 编

昆仑出版社

目 录

C O N T E N T S

- 我与《吉尔·布拉斯》/杨 绛[1]
- 我与《神曲》/田德望[3]
- 谈翻译/王辛笛[8]
-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翻译前后/梅 益[11]
- 《爱玛》翻译与修订过程中的甘苦/刘重德[14]
- 辞书杂谈/孙绳武[19]
- 往事/郑永慧[23]
- 《平家物语》琐记/申 非[26]
- 蒋路与《怎么办?》/凌 芝[28]
- 我为什么要重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钱春绮[31]
- 我译《约翰·克里斯托夫》/许渊冲[35]
- 《浮士德》和我的中译本/绿 原[39]
- 译事收场白/徐成时[44]
- 人的遭遇与书的遭遇/草 婴[48]
- 我译的第一部英国小说《问题的核心》/傅惟慈[53]
- 喜爱济慈,认识济慈,翻译济慈/屠 岸[58]
- 谈谈全息翻译/吴 劳[64]
- 我译《骗子外传》/吴健恒[68]
- 我译儿童文学/任溶溶[72]
- 译诗——难谈的学术问题/高 莽[75]

CONTENTS

翻译杂谈/金 中[78]

《尤利西斯》翻译始末/文洁若[82]

苦涩的笑/王永年[86]

一部名作译本的五十年/智 量[88]

译事随感/梅绍武[96]

译介《雪国》的甘苦/叶渭渠[101]

《愚人船》琐谈/鹿 金[105]

我译雪莱/江 枫[108]

行人寥落的小径/李文俊[115]

翻译杂谈/桂裕芳[119]

翻译《裴多菲文集》有感/兴万生[122]

我与《春雪》/唐月梅[128]

谈《莱蒙托夫全集·抒情诗Ⅱ》的翻译/顾蕴璞[131]

简短的翻译经历/蓝英年[135]

玫瑰乎？蔷薇乎？/戴 聪[138]

我译《绞刑架下的报告》/蒋承俊[141]

我译茨威格/张玉书[144]

应该译介什么样的外国作品/孙家孟[148]

我译《磨坊文札》/柳鸣九[151]

我译《日本战后名诗百家集》/罗兴典[155]

CONTENTS

- 人可以个个很美丽/马振骋[157]
- 诗人与世界/张振辉[161]
- 翻译:甘苦得失寸心知/叶廷芳[166]
- 想起艾尔勃夫之旅/罗新璋[170]
- 我译博尔赫斯时的尴尬/林一安[176]
- 译事之乐/王晓峰[180]
- 双城情结,双城情解/张 玲[184]
- 文学翻译:一件吃力难讨好的事/吕同六[188]
- 我与普鲁斯特的缘分/袁树仁[192]
- 《奥德赛》翻译琐谈/王焕生[197]
- 译书难得是奇缘/李玉民[202]
- 走近博尔赫斯/赵德明[206]
- 《铁皮鼓》翻译随想/胡其鼎[211]
- 功夫用在译文之外/胡允桓[215]
- 如何传神/郑克鲁[220]
- 诗译杂谈/赵振江[224]
- 翻译旅途上的艰辛跋涉/沈萼梅 刘锡荣[228]
- 魅力无限的《简·爱》/黄源深[233]
- 译应像写/周克希[238]
- 《摩诃婆罗多》译后感/黄宝生[243]

CONTENTS

翻译家的无限风光/施康强[248]

我译《傲慢与偏见》/孙致礼[251]

我译《红与黑》/郭宏安[256]

《终极秘密》/吴岳添[264]

达雅难,信亦难/罗 芑[268]

变通与再创造/许 钧[272]

我译《上尉的女儿》/智 量[278]

我与《百年孤独》/吴健恒[282]

后记[286]



我与《吉尔·布拉斯》^①

杨
绛

《吉尔·布拉斯》是1956年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至今已有几十年了。可是翻译这本书的前前后后，一直难以忘怀。

抗日战争胜利后，全国解放之前，我们的女儿得了指骨节结核症，当时还没有对症的药。医嘱补养休息，尽量减少体力消耗。我们就哄女儿只在大床上玩，不下床。

钟书的工作很忙，但他每天抽空为女儿讲故事。他拿了一本法文小说《吉尔·布拉斯》，对着书和女儿讲书上的故事。女儿乖乖地听爸爸讲，听得直咽口水。

我业余还兼管全部家务，也很忙，看到钟书讲得眉飞色舞，女儿听得直咽口水，深恨没有功夫旁听。我记起狄更斯《大卫·科波菲尔》里曾提到这本书，料想是一本非常有趣的书。

钟书讲了一程，实在没功夫讲，就此停下了。女儿是个乖孩子，并不吵闹着要求爸爸讲故事，只把这本书珍惜地放在床头，寄予无限的期待与希望。

我译完《小癞子》，怕荒疏了法文，就决心翻译《吉尔·布拉斯》。我并未从头到尾读一遍，开头读就着手翻译。

我的翻译原是私下里干的，没想到文学所成立会上，领导同志问我正在干什么，我老实说正在翻译《吉尔·布拉斯》。我的“私货”就出了官。

我应该研究英国文学，却在翻译法文小说，而研究所的任务不是翻译。我很心虚，加把劲将这部长达四十七万字的小说赶快译完。1954年1月起，在《世界文学》分期发表，还受到主编陈冰夷同志的表扬。但是我自己觉得翻译得很糟，从头到尾，没有译出能让读者流口水的段落。

我求钟书为我校对一遍，他答应了。他拿了一枝铅笔，使劲在我稿纸上打杠子。我急得求他轻点轻点，划破了纸我得重抄。他不理，他成了名符其实的“校仇”，把我的稿子划得满纸杠子。他说：“我不懂。”我

说：“书上这样说的”。他强调说：“我不懂。”这就是说，我没把原文译过来。

我领悟了他的意思，又再译。他看了几页改稿，点头了，我也摸索到了一个新的翻译水准。我的全部稿子，1955年才交出版社。

人民文学出版社的法文责编是赵少侯。一般译者和责编往往因提意见而闹别扭，我和赵少侯却成了朋友。因为他的修改未必可取，可是读来不顺，必有问题，得再酌改。《吉尔·布拉斯》是1956年1月出版的。1962年我又重新校对修改一次。我现在看了还恨不能再加修改。译本里有好多有关哲学和文艺理论的注是钟书帮我做的。很好的注，不知读者是否注意到。

多年后，我的女儿对我说：“妈妈，你的《吉尔·布拉斯》我读过了，和爸爸讲的完全不一样。”原来钟书讲的故事，全是他随题创造，即兴发挥的。假如我把这部小说先读一遍，未必选中这本书来翻译。这部小说写世态人情，能刻画入微；故事曲折惊险，也获得部分读者的喜爱。但不是我最欣赏的作品。



《堂·吉珂德》插图阿隆索



杨绛先生译的
《堂·吉珂德》跟这
幅有名的插图一
样，简练而传神

杨绛

(1911—)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所研究员，已退休。曾从事翻译工作，业余亦创作小说、散文等。主要作品为《杨绛文集》八册：前四册为创作，如《干校六记》《我们仨》（散文卷）《洗澡》（小说卷）等；后四册为翻译，如《堂·吉珂德》《斐多》等。

① 《吉尔·布拉斯》1956年1月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初版到1994年前后印了8次，共印了15.7万套。（编者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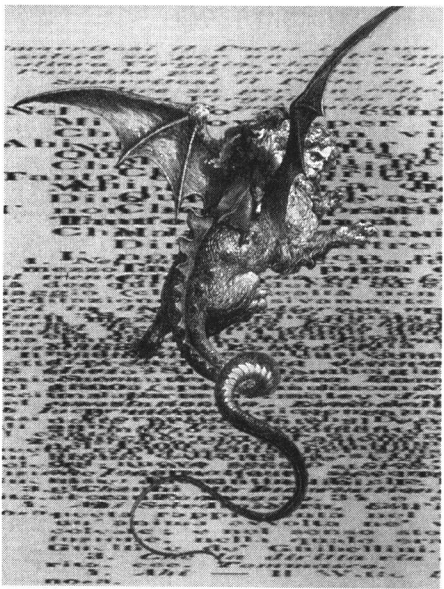
我与《神曲》^①

田德望

《神曲》是但丁的代表作。是一部以诗人自己为主人公的史诗。《神曲》的故事采取了中古梦幻文学的形式，作品的主人公在人生的中途发现自己迷失了正路，走进了一片幽暗的森林；他彷徨了一夜，才走出森林，来到一座曙光笼罩着的小山下，刚开始登山，就被三只野兽（豹、狮、狼）挡住了去路。危急时刻，古罗马诗人维吉尔出现了。他受贝雅特丽齐（但丁精神上的爱人）的嘱托，前来搭救主人公，并引导他去游历地狱和炼狱，接着贝雅特丽齐又亲自引导他游历天国。游历过程和见闻构成了《地狱篇》、《炼狱篇》和《天国篇》三部曲。

对于这部恢宏的史诗，早在我读中学时就有接触。当时通行的是钱稻孙翻译的《神曲一裔》。虽是“一裔”，但我读了之后，对但丁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开始留意《神曲》在我国翻译的进展。

钱稻孙是我国最早翻译《神曲》的。后来我的朋友山西大学的常风教授来信告诉我，最早提到但丁和他的《神曲》的是钱单士厘所著的《归潜记》（1910年）一书，随后把书给我寄来了。原来钱单士厘就是钱稻孙的母亲。她的丈夫任清政府驻意公使，她随丈夫在罗马期间留意异邦的政教、文化、艺术，《归潜记》一书就是详细地记述了她在那里的广博见闻。其中在有关彼得寺（即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的记述中，提到寺内有教皇保罗三世墓，“墓基四女石像，曰‘富裕’，曰‘慈悲’，……曰‘谨慎’，曰‘正直’。……‘谨慎’像又酷肖义儒檀戴（即但丁），有‘彼得寺中女檀戴’之称……”又在对墓室内各代教皇棺的记述中还提到了《神曲》和其中的人物：“婆尼法爵八（即卜尼法斯八世）棺残片，有铭曰：‘其来也如狐，其宰政也如狮，其死也如犬。’义儒檀戴所著《神剧》（即《神曲》）书中，清净山（即炼狱山）凡九重，最下一级，遇婆尼法爵，即指此人……”这些



《神曲》插图

记述虽不尽翔实可信,但在当时(清朝末年),能注意及此,已是难能可贵。

钱稻孙先生幼年随父母侨居罗马,当时已经读了《神曲》原文。归国后,陆续将一、二、三曲译为骚体,在1921年但丁逝世600周年之际,用《神曲一裔》为标题,发表在《小说月报》上。1924年出单行本,为《小说月报丛刊》之一。译文典雅可读,可惜后来他搁置未续。^①

进了清华大学西方文学系后,得以阅读到英译本《神曲》,对这部作品发生了更大的兴趣,于是我选修了一位英国教授用英语讲授的《神曲》课。这位教授曾经做过罗马贵族家庭的英语教师,精通意大利语,而且酷爱《神曲》。这位教授讲课时,常爱朗读一些精彩片断的原文给学生听,这些原文片断的韵律美总让我心醉。我就毅然中断已学了两年的法语,在这位英国教授的指导下,自学意大利语。

学了意大利语后,越读越领会到《神曲》原作的韵味,兴趣随着日益浓厚。

进了清华大学外国研究所后,我继续自学意大利语不辍,不久便能阅读英国出版的英意对照的《神曲》了。我作研究生毕业论文时,由一位讲授欧洲文艺复兴时期文学的美国教授做导师,用英文写了《但丁〈神曲〉和弥尔顿〈失乐园〉中比喻的比较研究》。论文获得了好评,顺利通过答辩,同时还获得了意大利的奖学金。在吴宓教授的建议下,由清华外国研究所公费派我去意大利留学,在佛罗伦萨大学师从莫米利亚诺教授继续攻读但丁和文艺复兴时期文学,获博士学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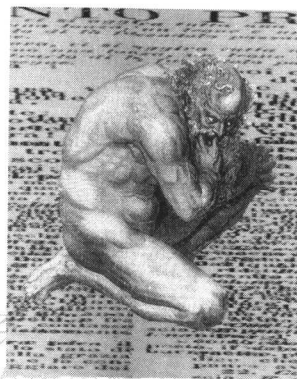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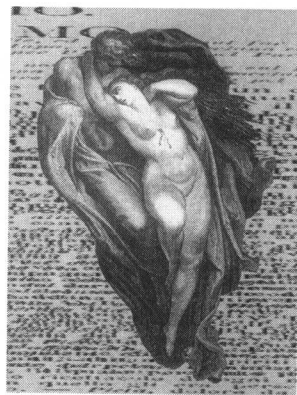
在如此长久的求学生涯中,我一直有一个强烈的愿望,那就是学成以后,一定要从原文翻译《神曲》这部传世之作。《神曲》就像一盏明灯,鼓舞着我学习,也激发着我翻译它、介绍它到中国来的愿望越来越强烈。为此,在意大利留学期间,我就注意收藏那些经专家校订,注释精辟的《神曲》版本。

我1939年回到祖国,回国以后一直是以德语

我的目的仅在于使读者通过译文了解《神曲》的故事情节和思想内涵
欲欣赏诗的神韵及其韵律之美,就须学习意大利语,阅读原作。正如
所说的:“入都知道,凡是按照音乐规律来调配成和谐体的作品都不能

教授身份在大学里讲授德国语言文学,没有机会教意大利语言文学。有限的业余时间和假期,只译了几部凯勒的著作。“文化大革命”中,我又被派往外文局参加《毛泽东选集》的德译工作,之后又参加北京大学和上海外语学院协作的编纂《德汉词典》,没有多余的时间来实现翻译《神曲》的心愿。

从1921年钱稻孙第一个翻译的《神曲》之后,又有6种中文译本问世,但除了钱译的之外,都是从英、德文版本转译的。80年代初,当时担任中国社科院副院长的周扬同志希望外文所所长冯至物色一位译者,认真重译《神曲》。冯至同志当即决定聘我为外文所的“特约研究员”,委托我专门从事《神曲》的翻译工作。长期以来,国内一直都没有二战以后最新出版的、包含有最新研究成果的版本可供我翻译。可巧的是1982年,国际意大利语言文学学会会长勃朗卡教授来中国,访问了中国社会科学院外文所,冯至同志就介绍他来北京大学与我会晤。通过交谈发现,我俩竟然都是莫米利亚诺教授的弟子,于是一见如故。当我提到,手头缺少新出版的最佳《神曲》版本时,勃朗卡先生当即就答应他回意大利后,立即给我寄一套意大利但丁学家翁贝尔托·波斯科和乔万尼·雷吉奥合注的《神曲》。后来在翻译《神曲》时,译文和注释主要是根据这个版本。在其他的工作告一段落后,我开始试译《地狱篇》。那是1983年的秋天,我已是73岁高龄了。刚动笔时,感到困难重重,力不从心,茫然不知所措。对着镜子,看着自己稀疏的头发,真感到老之将至,捧起书本,读着《神曲》,又感到自己回到了从前,为了我心中已久的向往,为了把《神曲》直接从意大利语译介过来,我开始向自己挑战。我已老迈,脑力、体力不断衰退,我仿佛像一个运动员开始与时间赛跑。



《神曲》插图

言而喻,《神曲》博大精深,翻译《神曲》的先决问题是译成诗还是散文。对此我曾考虑很久,也问过朋友们,大家意见很不一致,最后我决定译成散文
我的欲欣赏诗的神韵及其韵律之美,就须学习意大利语,阅读原作。正如
所说的:“入都知道,凡是按照音乐规律来调配成和谐体的作品都不能
一种此为译读,需要完整PDF请访问www.cttpbook.com

文。就主观条件来说,我不是诗人,而《神曲》是极高的诗,如果不自量译成诗体,恐怕“画虎不成”,使读者得到错误印象,以为但丁的诗也不过尔尔。意大利有句俗语:翻译者——背叛者。我不愿这句俗语在自己身上得以证实。就客观条件来说,《神曲》全诗都是用“三韵句”写成的。汉语和意大利语属于不同的语系,诗律也根本不同,中国旧体诗没有与“三韵句”相当的格律。钱稻孙用骚体译《地狱篇》前三曲,但押韵格式不依照《离骚》,而力图“倣其韵之法”。开端译得很好:“方吾生之半途,恍余处乎幽林,失正轨而迷误。其道况兮不可禁,林荒蛮以惨烈,言念及之复怖心!戚其苦兮死何择,惟获益之足谘,愿覩缕其所历。”但是第二、三曲的译文,没有再严格依照这种格式押韵。不仅如此,《神曲》每行一般都是11个音节,钱译则每行少者6个字,多者十三四个字,远不如原诗的韵律严整匀称。钱先生通晓意大利文,对《神曲》和中国旧诗都很有研究,他的翻译实践说明,把《神曲》译成旧体诗是不易成功的。

那么,可否把《神曲》译成新体诗呢?中国新诗的格律没有定型,译时苦于无所遵循。如果按照“三韵句”的格式押韵,原诗的韵律(抑扬格、音步等问题)应如何处理?如果不按照“三韵句”的格式押韵,那么应当依照什么格式呢?我对此感到困惑。因此,决定就自己的能力所及,暂把《神曲》译为散文,等将来新体诗的格律问题解决后,我国出现既有诗才又通

晓意大利文的翻译家时,再把这一世界名著译成诗体。

在考虑用诗体还是散文体时,我也曾借鉴一些英文和德文译本。英语和德语虽然与意大利语同属印欧语系,但意大利语元音较多,适于用“三韵句”写诗,英语和德语就不大适用这种格律。用“三韵句”写成的英文诗,最成功的作品是雪莱的《西风颂》,全诗5节,共70行,

算是较长的抒情诗,但和《神曲》的篇幅相比,相差还很远。英、德翻译家也有用这种格律译《神曲》的,他们步武前贤,刻意求工的精神是令人钦佩的,然而对照原文细读,就会发现,他们为使译文合乎格律,往往削足适履或添枝加叶。前一种做法有损于原诗的内容,后一种做法违背原诗凝炼的风格。译成抑扬格无韵诗的译本,如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译本,由于不受韵脚束缚,这种缺点很少出现;而完全摆脱格律束缚的散文译本,如美国但丁学家诺尔顿的译本和辛格尔



但丁像

顿的译本,则尤为忠实可靠。这些事实坚定了我用散文体的信念。

不言而喻,把诗译成散文等于用白开水代替存放多年的美酒,味道相差甚远。我的目的仅在于使读者通过译文了解《神曲》的情节和思想内涵,如欲欣赏诗的神韵及其韵律之美,就须学习意大利语,阅读原作。正如但丁所说的:“人都知道,凡是按照音乐规律来调配和谐体的作品都不能从一种语言译成另一种语言,而不致完全破坏它的和谐与优美。”

在《神曲》三部曲中,我最喜欢的一部是《炼狱篇》。因为这部是写人世间生活的,人情

味重,怨恨少,而忏悔多,是三部曲的重中之重。所以我一心要把它译得更隽永,晓畅。翻译期间我与责任编辑王央乐同志和秦顺新同志的合作非常愉快。1990年《地狱篇》出版并举行了首发式后,王央乐同志就退休了。人民文学出版社又让曾任外国文学编辑室主任的秦顺新同志做《炼狱篇》和《天国篇》的责任编辑。秦顺新同志在看完21章后,给我写了一封信,其中说:“您所花费的心血,只有看了这部译稿才能了解。我代表未来的读者向您表示敬意。”我看了这些热情动人的评语备感欣慰。另在信内附带的小条上指出,我把《炼狱篇》第20章中原作的一句译成“就让贪婪之风冲

进神庙”。“冲进神庙”指法王腓力四世贪得无厌,非法解散圣殿骑士团,没收其巨额财产。我译为“神庙骑士团”,是通用的译法,经责任编辑指出,使一般读者避免误解为另一骑士团,对此我很感激。

2000年8月,终于译完了最后一部《天国篇》。历时18年的《神曲》翻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花费了我后半生的全部心血。古人云“人生七十古来稀”,而我已是90多岁的老人了,我能在有生之年,把这部伟大的经典之作全译本奉献给中国读者,是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值得庆幸的。

田德望

(1909—2000)^②河北省顺平县人。主要译著有:《凯勒中篇小说集》、《绿衣亨利》(上下册)、《神曲》(三卷本)。主编《中国大百科全书》外国文学卷意大利文学分册等。获得中国作家协会中外文学交流委员会1994年的“彩虹”翻译奖荣誉奖。《神曲·地狱篇》获意大利文学遗产部1991年度国家翻译奖。1999年意大利总统接见田德望先生,并授予意大利“一级骑士勋章”。2002年《神曲》(三卷本)荣获北京大学第八届人文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一等奖。2003年《神曲》珍藏本荣获第六届全国优秀外国文学图书奖一等奖,同时荣获新闻出版总署颁发的第六届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奖。

- ① 80年代初,翻译《神曲》被定为国家重点工程,请出已是73岁的北京大学教授田德望先生。田德望先生历时18年,呕心沥血,终于在90岁时完成。1999年,意大利总统接见田德望先生,并授予意大利“一级骑士勋章”。(编者注)
- ② 2001年,田德望家人得悉编者在组织该书的约稿,特意将田德望先生生前的手稿整理后送来。(编者注)



我自幼就有尝试翻译的幼稚愿望,10岁开始学英语。那时有一位在南开大学任教的陈先生刚从美国回来不久,我父亲就请他教我英文。每周我去陈先生家3次,从《华英初阶》读起,再读《贝肯读本》、《伊索寓言》等浅近儿童读物。白天先生给我讲了一个英文小故事,晚上我就把这故事直译成中文。甚至把这些译文订成一个小本本,藏在抽屉里,自我欣赏,这是我最初的“译文集”。

在南开中学读高中时,我在家里找到几本《蓝皮小丛书》,印着莎士比亚、王尔德、萧伯纳等著名作家的警句,我很喜欢,就把它们译成中文,投到天津大公报副刊,居然一一发表了。初次拿到稿费,我斗胆逛起外文旧书摊和旧书店,买到美国近代丛书版的两本书:《俄国最佳短篇小说选》和《波德莱尔散文诗》。后来选译了加尔洵的《旗号》和莫伯桑的《农夫》,发表在《国闻周报》上。

考入清华大学后,在吴宓开设的《古希腊罗马文学》课上,要求读荷马史诗《伊利亚特》、《奥德赛》,罗马史诗维吉尔的《伊尼德》(现译名为《埃涅阿斯纪》)等,学生看的都是散文体英译本。我琢磨着,若将史诗形式的古希腊语译成诗体的英文又会如何呢?当然,我认为散文体英译本还是转达了史诗的叙事情节、风格 and 特点。然后,我又了解了蒲伯这位英国桂冠诗人。蒲伯的诗在英国被认为是新古典主义,他主张格律诗,学问不错。我最先读到他的两篇论文《批评论》和《人论》,均用诗体写就,文体风格像中国古诗的味道,音韵铿锵,表达明晰,文字整齐易懂。接着又发现他竟用诗体翻译了荷马和维吉尔的史诗,在我看来,这实在了不起,这将解答我在阅读散文体史诗时所产生的问题。但是,不想拜读之后大失所望,蒲伯费尽心力译成的诗体史诗反而不如散文体译的好,散文体英译本

谈翻译

王辛笛

倒是把荷马和维吉尔原文的丰富内涵和味道表达了出来,而诗体英译本却使之荡然无存。以后我还读到过诗体英译本的但丁《神曲》,也留下不如散文体的印象。从那时候开始,我形成自己对翻译的看法:小说可以翻译,但诗是不能翻译的,各民族语言有自身的特点,节奏音韵各不相同,有时含义可以转译过来,诗美却很难再现;无论译者的学问多么好,在翻译的过程中必然会失去原汁原味原样,如果译者不是诗人,可能会译得更不像诗。

在大学期间我曾读到徐志摩翻译哈代的诗,就去找原版诗来读,觉得哈代的诗有独到的魅力,最喜欢哈代的一首题作《The Voice》(《呼唤》)的诗,是他为悼念其前妻逝世而作于1912年12月。我反复诵读,那韵律,那调子凄切而柔和,使人想起招魂的呼唤。这首诗我久已想翻译出来,但两种文字转换时总让我感到还是读原诗为好,好像一译就将原来的诗美破坏了,在我看来,译诗是一件不甚愉快的事。及至年长一些,我才比较客观,认为译诗虽是不得已而求其次,但为使不懂外语的读者能接触外国诗歌,译诗还是必要而有益的,译者功不可没。而对哈代这首诗的翻译直到84岁才完成:

思念已久的妇人啊,你是怎样呼唤我的,呼唤我的,

说你现今已不再是过去的你

当你一反全心爱我时的那样子

而是一如最初,我们拥有美好的时光。

……

如此,我,逡巡起来,

落叶纷纷围在我的周遭,

风正渗透荆棘从山北而来,

而妇人仍在呼唤着呢。

同样,我的新诗集《手掌集》分为三篇:“珠贝篇”、“异域篇”、“手掌篇”,在每一篇的前面分别引用我所喜爱的英国诗人霍浦金斯、艾略特、奥登的英语诗句原文,当时也没有翻译出来。到近年我才将其中两位的诗句翻译了出来,并在最后用括弧注明是译意或试译。

80年代初,我去加拿大参加国际诗歌节,由我主持专题研讨会“诗歌的翻译”,迫使我重新思考诗歌翻译的问题。中国翻译界老前辈严复提倡“信”、“达”、“雅”三字经,而我的体会是,在满足了“信”(忠实于原文)、“达”(文意通顺,合乎本国语文习惯)的要求之后,更要体现“雅”字,但不是“阳春白雪”之雅,而是要传神,表达出原诗的诗味、意境来。这正是诗歌翻译中不太容易达到、也不太容易把握的水准,但却算是较好的译作。以后一些外国友人来中国访问,写了一些英文诗,请我翻译,我在忠实于原文的基础上,还是追求诗意表达上的神似。记得在作家协会举办的座谈会上,美籍华人女作家聂华苓的丈夫安格尔朗读了他写的两首英文诗《马群》和《驴子》,聂华苓请我翻译成中文,她对我将《驴子》一诗的最后一句:“you will wake up a huge and powerful horse”译成“你们醒来会成为一匹高头大马”激赏不已。我还为安格尔翻译了《上海印



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中译本插图

象》等。

80年代末我大病一场后,居家调养,老伴徐文绮与诗友杜南星合译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完稿,我为老伴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动,也奋力参加了全书的校译工作,于1990年秋将南星和文绮分别翻译两部分的译稿通校了一遍,并写了长文《译本序》,漫谈狄更斯的魅力在于小说故事性强,有头有尾,事事有交代;对于人物和环境的描绘惟妙惟肖,赞叹他对伦敦街道环境之熟悉程度,特别是关于夜景的描绘让人神往,俨如置身其境;展示生活细节的不厌其详,处处以悬念引人入胜;以故事情节透露他单纯的道德观“善良终必战胜邪恶”等。尽管历来对狄更斯小说的批评也不少,结构松散,人物性格定型,缺乏立体感等,但出于对语言表达的敏感,我以为狄更斯最大的缺点是语言过于冗长罗嗦,从翻译的角度感到这点特别明显。

从少年时代开始翻译,颇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劲头,到青年时代认为诗是不可翻译的,再到老年重试译笔,尽管数量不多,但其中个味值得品尝。

王辛笛

笔名辛笛,1912年12月生于天津,2004年1月病逝于上海^①。清华大学外文系毕业,留学英国爱丁堡大学,与著名诗人艾略特、史本德、路易斯、缪尔等曾相过从。回国后在暨南、光华两大学任教授。兼任《美国文学丛书》及《中国新诗》编委。历任中国作家协会理事、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中国作协名誉委员、上海作协顾问、国际笔会上海中心理事、上海外文学会会员、上海翻译家协会会员。主要作品:新诗集《珠贝集》(1936)、《手掌集》(1948)、《辛笛诗稿》(1983)、《印象·花束》(1986)、《王辛笛诗集》(1989)、中英对照《王辛笛短诗选》(2002)、《九叶集》(合集1981);散文集《夜读书记》(1948)、《娜嬛偶拾》(1998)、《梦徐随笔》(2003);旧体诗集《听水吟集》(2002);主编《20世纪中国新诗辞典》(1997);译作短篇小说、诗歌几种、狄更斯长篇小说《尼古拉斯·尼克尔贝》(杜南星、徐文绮译;王辛笛校1998)。

① 2003年初,王辛笛先生的女儿转来《谈翻译》的文稿和图片,当时,王辛笛、徐文绮夫妇都还健在。遗憾的是,书出版时两位老人却已先后病逝。(编者注)



《钢铁是怎样炼成的》 翻译前后

梅
益

说明一部名著的创作过程，可能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它可以增进或加深读者对该名著的理解。但是说明一部外国名著的翻译过程，却不一定会引起读者的兴趣。因此要我写翻译《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的经过，我始终犹豫不决，迟迟没有动笔，虽然这部名著在国内拥有大量的读者。

几十年来，《钢铁是怎样炼成的》这本书一直不断再版，盛传不衰，影响了一代又一代人。仅从1979年到1995年的26年间，前后便印了32次，发行量达到130多万册。^①此外，根据这部作品改编的同名电视剧也拥有大量的观众。至于说我和《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一书最初是怎样结缘的，那还是半个世纪以前的事了。

1937年我在上海地下党工作时，一直同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保持着联系。当时任办事处秘书长的刘少文同志交给我的任务，就是把那时在上海出版的《字林西报》、《泰晤士报》、《大陆报》、《大美晚报》、《密勒氏评论报》等英文报纸上发表的有关中国问题的评论，按月摘要译出并写成汇报，然后经由八办转报延安中央。这项工作很繁忙，我每天都要到八仙桥青年会图书馆去看报，每周要翻译上万字的英文资料，还要写几千字的汇报。上海八路军办事处对我的工作是满意的。1938年的某一天，刘少文同志带了一本英文小说来对我说，一位外国同志从美国到上海来，给了他这本小说。这是一本在苏联国内颇有影响的小说，对青年人有很大的教育意义。他把书交给我，又郑重地说，党组织作为一个政治任务，要你把这部小说译出来，而且越快出版越好。既然是组织上交待的一个任务，尽管困难很多，我还是接受下来，但说明我因有日常工作在身，不能全力以赴，只有挤时间一点一点地进行，他同意了。这本书就是当时刚刚译成英文出版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